

壹、前言

《1984年》是英國現代著名小說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於一九四八年所創作的一部政治諷刺小說。該書的問世，使得奧威爾本人被西方文學評論家捧入現代經典作家之列，其論文《政治與英語語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已成英美文學系學生必讀書目。全面地、歷史地分析評價奧威爾的這部著名小說，有助於加深我們對這位作家的瞭解，而我們對奧威爾思想特質的把握反過來又能加深對這部政治諷刺小說所揭示的深刻哲理的理解。

貳、奧威爾與《1984年》

喬治·奧威爾一九〇三年出生於當時屬於大英帝國殖民地的印度，其父是當地英國殖民政府裏的一位下級文職官員。返回英國後，一九一七年獲獎學金進入貴族化的伊頓公立中學就讀，成績優異，並開始在學校刊物撰文，其文學才賦嶄露頭角。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社會主義思潮在西方國家風行一時。和當時的許多年輕人一樣，奧威爾開始接觸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和社會主義思想。一九二一年從伊頓畢業後，奧威爾放棄了有極大可能在國內找到體面工作的機會，前往緬甸，充任在那裏的英國皇家警察。在緬甸，他深切地體察到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罪惡，對深負重壓的緬甸人民深感同情。他尤其不能忍受他的同胞將緬甸人像畜牲一般地驅使，這對他以後保持個人自由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一九二七年，奧威爾回英國並辭去公職，開始了作職業作家的寫作生涯。這個時候，奧威爾是社會主義的激烈鼓吹者，試圖以文學創作的形式反映大英帝國的生活境況，並最終以社會主義的方式改變工人階級的命運。然而，一九三六年爆發的西班牙內戰完全改變了奧威爾的政治理念，並使得他成了一個民主的個人主義者。奧威爾以記者身份赴西班牙，站在共和政府的一方與法西斯勢力作戰，並且負了傷，但是，事出偶然，他所參加的組織並非得到共產國際支援的國際縱隊，而是一個反史達林的託洛斯基（Trotsky）派組織。後來，支援共和政府的力量進行內部清理，奧威爾險些被當作託洛斯基分子處死。這個事件的發生，完全改變了奧威爾對共產主義和蘇聯共產黨人的看法，極度加深了奧威爾對極權主義可能破壞個人自由的恐懼和對極權者的仇視。儘管西

方文學評論家仍將奧威爾稱？社會主義者，他自己也從未作出過否認性的辯白，但奧威爾所認可的社會主義是正義、公平、體面、免除貧困、福利、保持個人自由等政治權利的代名詞，而無產階級專政與共？主義卻成？極權主義的別稱之一。創作於一九四八年的政治諷刺小說《1984年》便是奧威爾這種思想特質最清楚、最系統、最具象的表述。

《1984年》展現了一幅夢魘般的圖景。小說以一九四八年的倫敦？背景。這時候，全世界只剩下三個超級大國：大洋國（暗指美國與英國聯邦）、歐亞國（蘇聯及東歐集團）、東亞國。這三大國出於維護國內政權的需要常年保持著戰爭狀態。倫敦是大洋國的控制中心，大洋國的最高統治者是位一貫正確的、權力無所不包的極權主義者，被全體人民尊稱？「老大哥（Big brother）」。在「老大哥」之下，是核心黨（占總人口2%），其次是週邊黨（占總人口13%），再其次是毫無言論自由的占總人口85%的無？階級者。在這個國家裏，到處都張貼著「老大哥」的巨幅畫像，下面的說明文字是「老大哥在看著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官方所認可的語言叫「新話（Newspeak）」，其辭彙量被削減到最低程度，這樣人民就無法找到辭彙表達未經當局同意的東西。黨的三個主要口號是：「戰爭即和平、奴役即自由、無知即力量。」政府機構中則特設「真理部」主管新聞及各種文化活動，隨時改寫歷史，以適應當時政策的需要。而人數？多的無？者則純屬一群嗜酒如命、豪賭成性、愚昧麻木的群氓。小說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就在政府的真理部工作，專門負責刪除舊報紙和書刊中與現時政策相矛盾的章節和詞句，篡改、歪曲各種事件，編造老大哥及其親信以往的言論，使之與當前需要相合拍。總之，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修改、編造謊言，篡改、塗抹歷史。而他每天走進辦公室之後，一切就由不得自己了，電視監視器和竊聽器普遍設置在每個角落，隨時會記下人們的一言一行。然而，就在這種嚴酷的環境下，溫斯頓·史密斯還是走向了這個政權的對立面。他反對國家灌輸給人們的教條，對現狀極？不滿。？了表達他的反抗，他與女同事朱莉婭偷偷同居。他們的叛逆行？被發現後，史密斯遭到關押和審訊，最後這個異己分子的精神被徹底摧垮，他承認自己完全錯了，他熱愛老大哥。但是，他還是未能躲開來自背後的子彈。

單從這個故事梗概我們就可以知曉奧威爾創作的用意，即抨擊極權主義。奧威爾旨在說明極權專制統治給人民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悲慘的命運，它造成人們精神上的壓抑，剝奪了人的自由和權利，使人們喪失了作？人的價值和尊嚴。許多評論家（Reilly,

1986; Meyers, 1991) 認? , 儘管作者把倫敦作? 該小說的背景, 而且似乎籠統地抨擊極權主義, 但歸根結底, 其矛頭主要是指向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前蘇聯批評也認同這樣觀點, 如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主編的《英國文學史》(1870-1955), 對奧威爾的這部政治諷刺小說批駁得體無完膚, 貶損得一文不值, 指責作者刻意描繪一些極端無知、卑鄙無恥、腐化墮落的場面。其實, 只有那些自命? 人, 實際上失去理智、失去意志力、毫無人的美質的傢伙, 才會淪落到這般地步。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奧威爾擔憂的是整個人類的命運和前途, 他所描寫的是人類按其本質可能出現的問題, 因此不能認? 《1984 年》中所描寫的情況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所獨有的, 西方社會同樣可能感染上類似的疾病。奧威爾所要昭示的正是極權主義所可能導致的惡劣結果。奧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年的倫敦社會不僅綜合了蘇聯社會的負面情景, 同時也綜合了納粹德國的特徵, 還加上了英國, 尤其是戰時英國的特徵。他虛構出一個夢魘般的未來世界, 藉以具象地表述自己對所認識的現實政治的恐懼心理, 他對極權主義所發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 既針對史達林的蘇聯, 也指向西方社會的社會異化和精神墮落。作? 文學作品, 我們不能僅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它進行評判, 出於單純的政治立場而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就反極權主義而論, 它仍有其積極的一面。事實上, 奧威爾這部小說的成功之處並不在於它對某一具體政治體制的諷刺和嘲弄, 而在於披露了人性的陰暗面, 揭示了困擾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烏托邦政治理念的負面效應, 以及人類社會的內在弊端和造成這些弊端的心理原因。

參、烏托邦政治理念之負面效應

和介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許多進步主義論的作家一樣, 喬治·奧威爾對當時西方世界經濟蕭條歲月裏的下層社會的貧困和痛苦有深切的體察與不滿, 對英國社會與歐洲大陸的精神衰退和道德墮落反感強烈, ? 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 他選擇了社會主義, 並堅信社會主義是唯一有希望的政治制度, 而其他各種運動都是令人失望的。但是, 他堅持認? , 有必要把社會主義同烏托邦主義區別開來, 使之界限分明。在他看來, 社會主義者不同於烏托邦主義者之處在於, 社會主義者只是宣稱他們能夠把世界搞得更好, 但不能使之完美無缺, 即使實現了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和社會正義, 仍有許多問題

需要解決；而烏托邦主義者從本質上說卻是理想主義者，他們宣稱只要整個社會照他們所設定的政治經濟模式動作，人類世界便很快會臻於至善至美之境地。《1984年》便是依據這種理想主義者的宣言而合乎邏輯地展開的一幅社會場景，它所揭示的正是這種烏托邦政治理念的負面效應。

理想主義者對未來世界的構思，從總體上而言，屬於一種試圖描繪人類社會最理想方式的純理論作品。它所勾勒的美好前景，其實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理想。從本質上說，那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國家的設計方案。烏托邦政治理念是指一種與這種理念所生的現實環境不相符合的思想，這種思想的目的是在於徹底改變與此思想不符合的現實環境。然而，這種理想在原則上說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烏托邦理念是一種絕對的、不妥協的「完美主義」理念，它之所以不可能實現，是與其所追求的目標的完美性有關。可以說，這種目標的完美性阻礙了這種理念的倡儀者與實際執行者對現實問題的認知與處理。《1984年》所揭示的烏托邦政治理念的負面效應也即在此體現得最充分。理想主義者追求「完美社會」的實現而採用極權主義的方式，權力的高度集中與失去有效的制衡與監督又使這種權力極度地傾向於濫用，出於達到「完美主義」之目的而被濫用的權力，對人類歷史所生的深刻影響，值得後人反思與探討；而任何掌握了充分權力的極權者，實現理想社會，均會將最後的努力措之于全體民衆道德倫理水平的大幅提升。《1984年》國所描繪的大洋國亦不例外，換句話說，極權者不僅想要從外界對人民施加相當的壓力，使之遵循統治者所制定的各種政策，而且極權者非常希望通過強有力的道德說教，使被統治者遵循統治者認可的倫理規範，極權者將之視爲建立「理想社會」的最佳快捷方式。他們認爲，「理想社會」的實現，必須以道德爲有效的控制手段。然而，事實上，一個社會的完美程度不能以簡單、抽象的倫理尺度來判定，而只能以包含倫理尺度在內的歷史尺度來判定。以道德規範來圖解歷史，以政治關係來限制其他社會關係的發展，必然剝奪任何歷史首創精神。烏托邦理想的美妙夢幻足以成爲扼殺社會有機體活力的最佳理由。英國著名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Raymond Popper）認爲，烏托邦理念與歷史決定論的意識形態緊密相聯，形成一種「整體主義」的思想傾向。「歷史決定論關心發展，但並不是關心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發展，而是關心整個『社會』的發展，烏托邦工程也是『整體主義』的。二者都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在這個意義上的『整體』絕不能成爲科學研究的物件。二者都不滿足於『漸進修補』和『摸索前進』。

他們希望採取更激烈的方法。 都相信他們能夠發現『社會』的真正目的，例如，判定『社會』的歷史趨勢，或斷定他們那個時期的需要，從而發現『社會』的真正目的。這樣，他們就傾向於採取某種歷史決定論的道德學說。絕非偶然的是，提倡烏托邦計劃的作者，多半都告訴我們，計劃簡直是不可避免的。因？歷史正沿著一定方向前進，人們必須計劃，不管我們是否願意。」⁽¹⁾在這種情況下，權威主義意識也就在烏托邦工程的設計者和建造者那裏膨脹起來。然而，他們不能認識到，「權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許多人頭腦中的知識集中起來是不可能的，可是這種集中對於明智地運用中央集權是必要的。這一事實具有深遠的意義，既然不能確定在這？多的人的頭腦中的想法，他就只好消除個人之間的差別而使自己的問題簡單化，他必須用教育和宣傳來控制和統一人們的興趣與信念。例如，在大洋國裏，人們講一種『新話』。『新話』被統治者宣佈？主持『公道』，代表『公平』、『公正』理念的語言，『戰爭等於和平』、『無知就是力量』是這種語言反復陳述的要義，人們顯然？這種語言所迷惑而變得麻木。然而，這種試圖控制人們的精神的做法，勢必會毀掉發現人們真正思想的最後的可能性，因？它顯然與思想自由，特別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²⁾也就是說，烏托邦工程對於權威主義的依賴導致政治全能主義的控制，它要求個體對群體的無條件屈從，個體除了對群體觀念和行？模式的絕對認同之外，沒有任何現實的個性存在。這樣，人的生機勃勃的創造力，明判是非的思辨力，渴求真理的求知欲，均被扼殺在冠冕堂皇的圈套之中。主人公溫斯頓 史密斯雖然有相當的獨立之意志與自由之精神，但也很快在這種政治全能主義控制的現實社會面前碰得頭破血流。概念篡改、心理恐怖和精神侵凌是烏托邦工程設計與建造者的三大法器。在這種「理想社會」裏，對權力的覬覦與追逐得到空前的強化，個人掌握了權力就意味著獲得了以群體名義支配其他個體的權利，而個體的依附意識則剝奪了他們的首創精神，造成整個社會守舊心態的空前強化。最？糟糕的是，由於權威主義政治理念對社會的強力制控，使得道德規範成？外在的他律約束，而不是內在的自律意念。事實上，道德不僅有規範性（即對人的社會約束性和導向性），而且還有主體性（即在道德活動中，人所表現出來的主觀意向、創造性等作用）。道德的本質不是規範性，而是主體性。因？任何道德規範必須被行？主體理解，變？行？主體的內在信念，與行？主體的意志融合在一起，從而？生義務感、責任感、道德情感，最終引向道德活動。因而道德的規範性是以主體性形式表現出來的規範性，道德的本質在於道德

的主體性。然而，在極權主義控制下的社會中，由於道德責任和義務不是來自個人內在的堅定信念與自覺選擇，人們不願意承擔這種道德責任與義務。這樣，以倫理主義精神為基本框架建構的理想社會，其社會成員的道德感卻是非常差勁的。這就是追求完美社會帶來的弊端。其最根本的錯誤就在於，以泛道德主義思想基礎而設計建立的永恒化的完美社會，是決不可能成功的，因為要使這個社會永恒化，那就意味著要阻止變化過程的出現，有限度的修正也必須在最嚴厲的社會控制下完成，而人們根據自己的創造精神而從事的任何可能導致社會進步的事情必須嚴加阻止。這樣，一個烏托邦理想，即使夢想成真，也不過是一個靜止呆滯，死氣沈沈的社會。

肆、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應當充分肯定奧威爾反極權主義的某些意義。我們不能狹義地認為奧威爾的反極權主義便是針對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從宏觀上說，應說是針對整個世界範圍的極權主義傾向的（從國家不斷增長著的權力這點上說，即便是號稱「自由世界」頭號主人的美國亦不例外）。《1984年》的最大意義在於揭示我們這個世界的傾向。聯繫今日西方的現實，可以發現奧威爾的某些預言與現實極其相似。而我們把奧威爾的某些預言與史達林時期的蘇聯與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些政治和社會現象作一對比，就不難發現：確有許多觸目驚心的事不幸被他言中了⁽³⁾。因此，從反極權主義的角度看，《1984年》還是有一定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的。當然，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改善和世界民主潮流的向前發展，歷史上的錯誤不可能會再次簡單地重演，奧威爾的預言也不可能完全變成現實。

註釋：

- (1) 摘自卡爾 波普《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頁 58 59。
- (2) 同上，頁 71。
- (3) 摘自張中載 十年後再讀《1984 年》：評喬治 奧威爾的《1984 年》，《外國文學》，一九九六年第一期，頁 66。

參考文獻

- 卡爾 波普 (1988)。《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北京：華夏出版社。
- 張中載 (1996)。十年後再讀《1984 年》：評喬治 奧威爾的《1984 年》，《外國文學》，1：66 71。
- 喬治 奧威爾著，董樂山譯 (1998)。《1984 年》。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 喬治 奧威爾著，董樂山譯 (1985)。《1984 年》。廣州：花城出版社。
- 董樂山 (1997)。《奧威爾文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Bloom, H. (1987). George Orwell's Nineteen Eighty-Four. London: Chelsea House Pub.
- Levin, D., & Howe, I. (1963).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Nineteen Eighty-Four Text,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ed.
- Meyers, V. (1991). George Orwel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Orwell, G. (1992). Nineteen Eighty-Four. New York: Everymans Lib.
- Reilly, P. (1986). George Orwell, The age's adversa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